

· 宏观经济研究 ·

迈向高收入组别与社会结构转型

闫坤 唐丹彤

摘要: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我国正处于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关键阶段,文章以 1996 年至 2019 年全球 18 个成功迈入高收入组别的典型经济体为研究样本,结合我国当前内外环境变化,实证检验了人口质量、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城市化发展水平对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和提高收入分配均衡程度,将推动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城市化发展水平整体上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倒 U 型关系。文章为支持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推动国民收入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人口质量红利 收入分配结构 城市化进程 社会结构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然而,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结构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处于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重要时刻。总结成功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国家的经验,分析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与风险因素,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当前阶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低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进阶的道路充满曲折与艰辛,我们既要看到我国在部分经济指标上已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的事实,也应认识到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调整仍在不断推进中。考虑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我国跨越中高收入阶段的历程或许会受到外部冲击和经济波动的影响,但最终实现高收入转型应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引言

2022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到 12850 美元^①,距世界银行 2023 年 6 月最新发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13845 美元^②仅一步之遥。这意味着中国即将实现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历史性跨越,也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将开启崭新的篇章。然而,在这一历史性时刻,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组别跨越的进程也承受来自内外部双重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社会结构及制度供给提出了新要求。个体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经济行为必然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经济转型也必然与社会结构变迁息息相关。社会结构是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且内涵丰富的概念,通常被定义为“存在于不同社会行动者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孙立平,1996)。本文所探讨的社会结构转型是指个体社会关系与行动所形成的群体分化特征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旨在为经济发展趋势提供更加丰富的解释(Davern, 1997)。

自从 2008 年世界银行在针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主题报告中正式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以来,学界从未停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许多学者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经验证据等维度探讨了“中等收入陷

作者简介: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唐丹彤(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日本收入分配制度及其对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2STA034)。

^①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Open Data 数据库,采取 Atlas Method 换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指标(GNI per capita)。

^②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24 财年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别分类”,<https://blogs.worldbank.org/opendata/new-world-bank-group-country-classifications-income-level-fy24>。

阱”的存在,从人口特征转变、资源禀赋变化、增长方式转型等方面梳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蔡昉,2011),总结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驱动力(郑秉文,2011),并实证检验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换,指出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德荣,2013)。另外,还有学者基于新兴经济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分析总结这些国家落入陷阱背后的原因:赵秋运和林志帆(2015)认为催生于赶超战略的金融抑制政策,导致产业结构中工业部门比重过大,对经济转型升级形成阻力;孔泾源(2011)则将其归因于金融体系脆弱、收入差距过大、公共服务短缺、创新能力不足等。

迈向高收入组别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全面提升,更代表了社会层面人口结构和治理方式的全面进步。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分析为经济学研究成果向微观领域的落地与延伸提供了重要支撑,如刘欣(2018)利用社会阶层地位和分配关系分析了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演变;李雪(2018)以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解释了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邢占军(2011)研究了中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其在不同富裕程度的地区与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以此刻画并完善了向高收入阶段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制度建设;还有学者从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趋势(李培林,2017)、户籍制度改革(都阳等,2014)、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的关系(程文、张建华,2018)等视角出发,考察了全球代表性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成功条件与影响要素。

现有文献对先进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验教训和影响因素做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在此基础上,考察影响我国实现高收入跨越的社会转型因素,将社会结构转型特征纳入经济发展模型,深入探究现阶段限制我国实现高收入跨越的风险与困境,并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压力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将事实现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从先进经济体发展历程中归纳社会结构转型特征,并以总结发展经验作为分析工具,探讨社会结构因素影响我国向高收入行列跨越的重点难点,丰富了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第二,本文辩证地吸收了各国发展经验,更强调中国制度背景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一方面肯定中国过去在经济、社会、制度结构转型方面取得的历史成绩,另一方面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进一步探索中国制度体系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提出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定位的政策建议,助力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全面优化背景下向高收入行列迈进。

二、中国迈向高收入组别的社会结构转型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不仅要求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需要调整社会结构和治理方式,以推动制度供给的创新性和突破性变革。

(一) 供给结构长期失衡,人口质量红利有待释放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目前我国经济规模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并未实现实质性变革。一方面,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急需破解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上升,比较优势显著下降。同时拉美、东南亚等地区拥有更为低廉的要素价格,给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较大的替代压力。另一方面,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正经历深刻的变化。发达国家陷入“技术性”衰退,试图通过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来吸引产业资本回流,从而促进本国中高端制造业发展,使得我国外需承受较大压力。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担心中国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崛起会对其领先地位构成威胁,因此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这势必会对我国科技发展进步带来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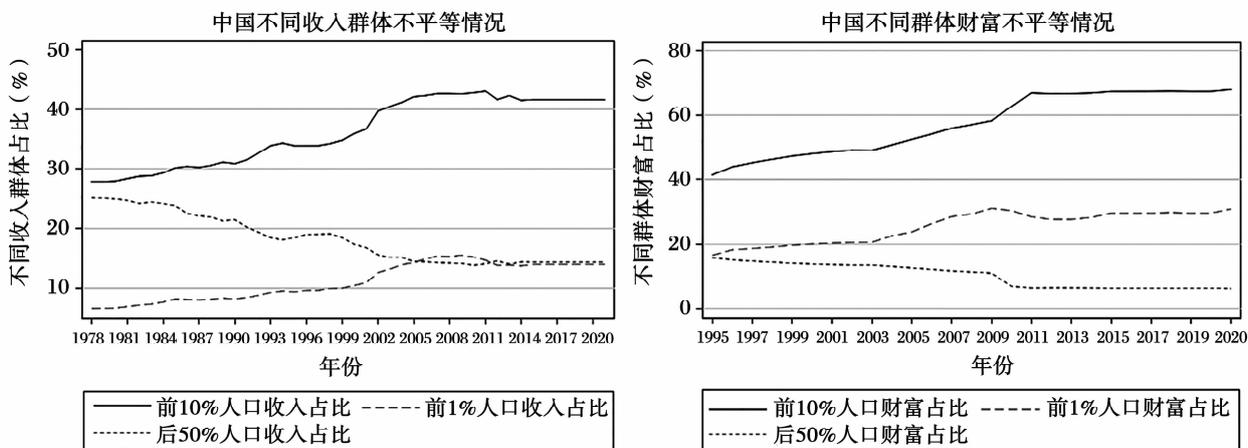
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在于突破技术壁垒、实现科技创新,需要依托人口质量的提升和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近年来,我国的高端技术产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核心技术产品仍然依赖进口,关键“卡脖子”技术成为限制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难点。赶超型经济体只有依靠科技自主创新才能走上产业高端化的道路,韩国等经济体的顺利转型就是成功先例。我国要想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突破,需要依靠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供给。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4.20%,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均值

32.59% ;2022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9.6% ,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4 年,远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然进入人口质量红利时期。因此,如何释放我国人口质量红利,成为我国迈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举措。

(二) 居民收入分配比例降低,共同富裕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国民总收入更多地通过储蓄转为投资而较少流向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动能。从我国三大需求主体来看,政府和企业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居民比例不断下降(白重恩、钱震杰,2009)。政府和企业具有更强的投资倾向,居民是主要的消费主体,国民收入分配向投资主体倾斜,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此外,在不同国民收入群体之间,国民收入总体上在向高收入群体倾斜(马晓河,2003;刘伟等,2018)。但高收入群体所占人口比重较少,且消费倾向较低、储蓄倾向较高(宿玉海等,2021),这促使国民总体消费比例降低、储蓄比例上升,进而有利于投资扩张。中低收入人群占据较大的人口比例,具有较强的消费倾向,但由于收入水平所限,消费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当前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虽然呈上升的趋势,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城镇居民、发达地区居民以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与财富上涨速度远超过农村居民、欠发达地区居民以及中低收入群体,且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也不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如图 1 所示,中国居民总体收入与财富水平产生较大的分化,收入最高的前 10% 人口在国民总收入中占比大幅提升,收入最低的后 50% 人口占比产生较大程度的下降;居民财富水平也出现类似变化,2021 年前 10% 与前 1% 人口的财富占比攀升至 68.03% 和 30.96% ,后 50% 人口的财富占比仅为 6.32% ,可见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正在逐步扩大。依据典型国家的转型经验可知,经济发展动能的转变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因此,要改变需求结构扭曲的现状,就要改善不同居民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提升居民共同富裕水平,从根本上提振居民消费需求。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下同。

图 1: 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财富占比情况

(三) 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人口城市化程度有待提高

所谓城市化是指伴随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城市发展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城镇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得城市规模和数量增长,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简新华、黄锴,2010)。我国城市化^①过程可简化为两个阶段:由工业化发展带

^① “城市化”英译为“Urbanization”,用于表达人口逐渐向城市转移、农村逐渐向城市转变的过程。世界多数国家没有“镇”这一概念,或镇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化”这一用语中未包括人口向城镇转移或集中的含义。由于我国设有镇的建制,镇的人口规模较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同时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因此我国官方政策文件通常使用“城镇化”作为专业用语。为了便于与其他国家城市化相比较,避免国内国外的两种表达存在概念表述上的不一致,本文使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一词,其内涵与我国“城镇化”相同。

动的城市化过程为第一阶段,工业化发展基本饱和后、以服务业为主体产业的城市化过程为第二阶段。

如图2所示,纵观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几乎处于停滞阶段,1978年至1999年城市化率每年增长0.7%~1%,2000年以后城市化率保持每年1%以上增长。反观我国工业化程度,1978年至2012年间我国工业化率始终保持在45%~47%,2013年随着服务业产值快速增长,工业化率开始缓慢下降至40%以下。可见,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并不同步,工业化发展要早于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我国当前处于第一阶段城市化向第二阶段城市化转型的过渡时期,供给结构更符合第二阶段特征,但需求结构更符合第一阶段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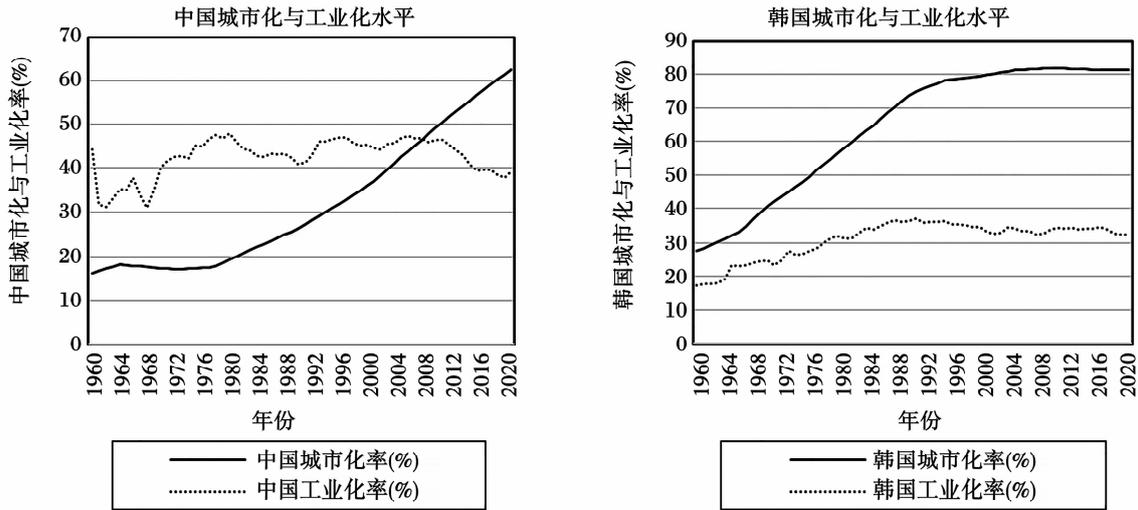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韩国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对比

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第二阶段的城市化是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外在特征之一。不同收入组别经济体的城市化率呈现较大差异,高收入经济体的城市化率接近70%以上,中高收入经济体城市化率在60%上下,随着收入水平下降,城市化率越低。对比韩国在相同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进程,可以更加清晰地发现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1960年至1984年韩国的城市化率从27.71%增长至63.30%,工业化率从17.33%提升至34.51%;在1984年至2018年韩国的工业化率稳定在34%~37%区间,城市化率从63.30%持续增长至81.46%。反观我国在1978年工业化率基本稳定时,城市化才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比同时期韩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以上。^①通过采用2015年不变价美元来衡量的中韩人均国民总收入可以发现,1995年中国人均GNI为1500美元,此时城市化率为30.96%,在同一收入水平时韩国城市化率为32.35%,表明通过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率与国民收入水平相符。随着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地区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且总体工业化发展步伐显著快于城市化速度。2004年中国人均GNI达到3054.48美元,城市化率达到41.14%,同一收入水平时韩国城市化率为48.03%。2011年中国人均GNI超过6000美元,城市化率达到50.51%,韩国同一时期城市化率为64.88%。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化步伐与工业化程度仍然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中国人均GNI超过1万美元,城市化率为60.31%,韩国同一收入水平下城市化率达到73.84%。由此可见,以人均收入水平来衡量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

^① 由于国别之间存在产业结构、人口规模、文化制度等的差异,直接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水平缺乏经济意义,由此本文更加关注指标之间规律性的变化特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典型国家在生产力全面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调整。

(一) 社会结构转型:人口质量红利释放

自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提出以来,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主题,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型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口质量的提升(Cai,2010)。学术界将人口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称为人口红利,考察世界各个经济体转型实践,可以发现人口红利在经济转型的不同时期表现为两个阶段性特征:第一,在劳动密集型主导的产业结构中,生产性人口相对于消费性人口的快速增长造就了第一阶段人口红利(Mason & Lee,2006)。充足的劳动力规模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出口导向型的赶超经济体早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Ronald,2013)。在此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同时也伴随着生育率下降,使得第一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边际递减趋势。第二,在产业结构由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转型过程中,相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教育水平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Lutz et al.,2019)。在此阶段,人力资本是触发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在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具有相似的正外部效应(Cuaresma et al.,2014)。特别是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转型过程中,劳动与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逐渐降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支持,人力资本又是知识和技术的源泉,几乎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潜力。当低抚养比与低教育水平并存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甚至会对收入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可见教育水平对人力资本的作用优于人口年龄结构(Lutz et al.,2019)。考虑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阶段,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逐渐增强(Hosan et al.,2022)

综上,第一阶段人口红利向第二阶段人口红利转变的过程,实则是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规模红利的过程。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需求,人力资本逐渐积累,人均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成为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的重要支撑。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提高促进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提升。

(二) 社会结构转型:收入分配相对均衡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人均富裕程度提升而扩大,但在工业社会和现代组织体系构建完善时,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人均富裕水平上升而缩小,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Kuznets,1955)。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主要发生在工业化早期阶段,此时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收入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Galor & Moav,2004)。经济增长从初始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人力资本的积累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力量,此时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则有助于更高水平的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一方面,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社会中,公共部门倾向于利用再分配机制对初次分配不均状况予以调解,再分配机制通过向富人筹集税收,再经由公共支出将其分配至穷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意味着通过再分配机制转移的财富越多,大规模的税收筹集与转移支付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效率损耗,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结果,从而抑制了经济增长(Bertola,1993;Alesina & Rodrik,1994;李曦晨、张明,2023);另一方面,财富初始分配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重要约束,在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个人借贷存在相对约束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存在不平等,导致社会总体效率的降低(De La Croix & Doepke,2003)。特别是,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被强化(Galor & Zang,1997),财富原始积累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多数人口的教育投资受到限制(申广军、张川川,2016),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相对均衡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提升。

(三) 社会结构转型:城市化率逐步提升

城市化率提升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然阶段 (Rosenberg & Trajtenberg, 2004)。产业发展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起步的经济体,大量农业人口顺应产业发展需要而转移 (Temple, 2005)。人口城市化转移的过程必然带来收入与消费提升,也意味着人口素质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提升促进以消费为主体的需求结构和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形成,人口素质的提高推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同收入组别经济体的城市化率呈现较大差异,随着收入水平下降,地区城市化率水平会降低。

人口众多能促进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也对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带来较大挑战,低收入经济体无法负担人口稠密所带来的负外部效应,应在工业化发展具备一定基础时相应开展城市化,由此城市化率应当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治理水平相适应 (Brunt & García - Peñalosa, 2022)。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契合程度较高。1962 ~ 2001 年韩国从农业人口比重超过 70% 的农业社会,转型为城市化率达 79.94% 的工业社会,同时国民收入从低收入组别跨越至高收入组别,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发生。巴西过早开启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城市化,是较典型的负面案例,1975 年巴西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 1000 美元时城市化率已达到 60.79%,超过韩国同时期 7 个百分点,1996 ~ 2006 年巴西人均国民总收入始终在 4000 至 5000 美元之间上下波动,而城市化率从 78.3% 上升至 83.14%,相同收入水平时期韩国的城市化率为 70.39%。过早地开启城市化,人口过快地向城市聚集使得配套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无法吸纳大量劳动者,直接导致城市失业率偏高、公共服务体系承压。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配能够发挥促进经济转型的正面效应,而过早的城市化使得高人口密度下的负外部性溢出,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城市化率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倒 U 型关系,与经济发展相配适的城市化率促进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提升。

四、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一)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了验证前文假设,本文构建了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ln GNI_{i,t} = \delta_1 Social_{i,t} + \delta_2 Econ_{i,t} + \delta_3 Trade_{i,t} + \delta_4 Openness_{i,t} + \delta_5 Finance_{i,t} + \delta_6 Dependency_{i,t} + \delta_7 PV_{i,t} + \delta_8 Gov_{i,t} + \lambda_t + u_i + \varepsilon_{i,t} \tag{1}$$

$$\ln GNI_{i,t} = \delta_1 Urban_{i,t} + \delta_2 Urban^2_{i,t} + \delta_3 Econ_{i,t} + \delta_4 Trade_{i,t} + \delta_5 Openness_{i,t} + \delta_6 Finance_{i,t} + \delta_7 Dependency_{i,t} + \delta_8 PV_{i,t} + \delta_9 Gov_{i,t} + \lambda_t + u_i + \varepsilon_{i,t} \tag{2}$$

其中, $\ln GNI_{i,t}$ 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国民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反映各国人均收入水平 (赵昕东、吴宇, 2022)。模型 (1) 中, $Social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是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代表了社会结构转型因素,具体可替换为人口质量红利、收入分配均衡程度和城市化进程。其中人口质量红利 (HC) 采用基于国家人口教育年限和教育回报计算而得的人力资本指数衡量,该指标较好地体现了我国人口红利带来的教育红利 (Cuaresma et al., 2014)。收入分配均衡程度 ($Unequal$) 由前 10% 收入份额度量,体现了收入分配过程中社会结构的“橄榄型”程度。城市化进程 ($Urban$) 采用城市化率衡量,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该指标越高,往往意味着城市化水平越高。考虑过度城市化同样不利于经济发展 (张来明, 2021), 为此针对城市化水平采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 (2) 中 $Urban_{i,t}$ 代表各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该模型中增加了 $Urban$ 的二次项,若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正 U 型关系,反之则意味着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倒 U 型关系。

除了社会结构,经济增长同样受经济结构、贸易水平、制度稳定性和人口结构特征的制约 (张来明, 2021)。基于此,模型 (1) 和模型 (2) 中,控制变量 $Econ_{i,t}$ 代表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即以美国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单位 1 而计算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 $Trade_{i,t}$ 反映各国

的贸易差额,采用货物和服务对外贸易差额占 GDP 的比例衡量; $Openness_{i,t}$ 反映各国的商品贸易开放程度,采用各国出口和进口商品贸易额占 GDP 的比例衡量; $Finance_{i,t}$ 代表各国金融发展程度,采用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 GDP 的比例衡量; $Dependency_{i,t}$ 反映各国人口抚养比,采用 15 岁以下及 64 岁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即 15 岁及以上和 64 岁及以下人口的比率衡量; $PV_{i,t}$ 反映各国制度稳定性,采用世界银行 WGI 数据库中政治不稳定性分项指标衡量; $Gov_{i,t}$ 反映各国的政府支出,采用一般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百分比衡量。回归中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

(二) 数据来源

本文以全球 191 个国家 1996~2019 年的国别数据为基础。在其中剔除人口规模低于 100 万的国家 and 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同时剔除样本期间始终处于低收入组别和高收入组别国家,处理后样本仅为人口规模高于 100 万的曾处于中等收入组别国家。随后本文依据世界银行自 1987 年开始至 2022 年发布的各国收入组别数据,借鉴费利佩等(Felipe et al., 2012)的研究,按照如下原则剔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1)持续在中低收入组别超过 28 年的国家或地区;(2)持续处于中高等收入组别超过 14 年的国家或地区;(3)自 1987 年至 2022 年始终处于中低或中高收入组别,或处于中低收入组别和中高收入组别的年限合计为 36 年的国家。依据上述筛选原则,本文最终得到自 1987 年以来成功从中等收入组别提升至高收入组别,并稳定处于高收入组别的 18 个国家,具体为:巴林、智利、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韩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巴拿马、波兰、葡萄牙、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乌拉圭。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PWT10.0 数据表和 WGI 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到,所有变量均处于合理区间,不存在较为明显的极端值。此外,各变量的方差相对较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回归结果的合理性。

表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ln GNI$	328	9.528	0.508	9.587	8.253	10.43
HC	328	3.026	0.449	3.070	2.128	3.849
$Unequal$	328	0.611	0.0813	0.595	0.420	0.820
$Urban$	328	71.28	12.04	68.47	51.31	95.05
$Econ$	328	0.698	0.118	0.678	0.484	1.176
$Trade$	328	1.845	7.804	0.606	-12.76	32.15
$Openness$	328	84.67	39.42	72.64	23.32	176.4
$Finance$	328	71.34	45.88	56.46	0.186	255.3
$Dependency$	328	47.64	7.414	47.52	28.85	78.04
PV	328	0.541	0.458	0.622	-1.335	1.437
Gov	328	17.86	3.655	18.52	10.04	30.00

(二) 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列(1)为仅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至(6)分别为增加社会结构转型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2)中人力资本指数(HC)与人均国民总收入($\ln GNI$)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人口质量红利对于人均国民总收入提升发挥了正向促进作用。人口质量改善有助于提高实物资本的使用效率和推进科技的进步,为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刘生龙、胡鞍钢,2010),证实了假设 1 成立。列(3)显示收入分配差距($Unequal$)与人均国民总收入($\ln GNI$)

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加剧会抑制人均国民总收入提升,验证了假设2。列(4)中城市化率(*Urban*)与人均国民总收入(*lnGNI*)的线性回归系数为0.0020,未达到统计意义上10%的显著性水平。在列(5)的非线性关系中,城市化水平(*Urban*)的二次项系数为-0.0014,一次项系数为0.1945,且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表明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证实与经济发展相适配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有助于促进人均收入提升,假设3成立。列(6)中同时考察了人口质量红利、收入分配均衡程度以及城市化率,三者与人均国民总收入(*lnGNI*)之间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显著变化,表明三个社会结构变量在联立方程中的实证结果依旧稳健。

表2:实证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i>lnGNI</i>	<i>lnGNI</i>	<i>lnGNI</i>	<i>lnGNI</i>	<i>lnGNI</i>	<i>lnGNI</i>
<i>HC</i>		0.3632*** (2.74)				0.3035** (2.26)
<i>Unequal</i>			-2.1501*** (-5.84)			-2.1678*** (-5.90)
<i>Urban</i>				0.0020 (0.28)	0.1945*** (4.82)	0.1369*** (3.41)
<i>Urban</i> ²					-0.0014*** (-4.84)	-0.0011*** (-3.93)
<i>Econ</i>	1.2271*** (9.39)	1.2855*** (9.82)	0.9172*** (6.82)	1.2436*** (8.64)	1.2892*** (9.29)	0.8780*** (5.95)
<i>Trade</i>	-0.0047** (-2.17)	-0.0058*** (-2.67)	-0.0052** (-2.55)	-0.0047** (-2.17)	-0.0053** (-2.52)	-0.0066*** (-3.29)
<i>Openness</i>	-0.0005 (-0.73)	-0.0010 (-1.40)	0.0010 (1.45)	-0.0005 (-0.67)	-0.0001 (-0.14)	0.0007 (0.94)
<i>Finance</i>	0.0001 (0.17)	-0.0002 (-0.44)	0.0005 (1.02)	0.0001 (0.23)	-0.0001 (-0.19)	-0.0002 (-0.39)
<i>Dependency</i>	0.0035 (1.32)	0.0055** (2.01)	0.0018 (0.70)	0.0035 (1.32)	-0.0011 (-0.40)	-0.0002 (-0.06)
<i>PV</i>	0.1466*** (4.23)	0.1224*** (3.46)	0.1287*** (3.91)	0.1490*** (4.17)	0.1512*** (4.40)	0.0929*** (2.66)
<i>Gov</i>	0.0174*** (2.81)	0.0129** (2.02)	0.0112* (1.88)	0.0176*** (2.81)	0.0253*** (4.06)	0.0119* (1.84)
<i>Constant</i>	7.4503*** (38.36)	6.4457*** (15.59)	9.0584*** (27.39)	7.2896*** (11.91)	1.1280 (0.80)	4.5564*** (3.19)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28	328	328	328	328	328
F	84.33***	83.76***	92.38***	81.34***	85.88***	92.61***
R ²	0.884	0.886	0.896	0.883	0.892	0.905

注:***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1$,下同。

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Econ*)、制度稳定性(*PV*)和政府支出(*Gov*)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贸易差额(*Trade*)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具有统计意义,表明国际贸易收支净额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成反比,贸易逆差代表国民具有更强的购买力,往往伴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

贸易开放程度(*Openness*)、金融发展程度(*Finance*)和抚养比(*Dependency*)的回归系数不具有稳定

的符号,且均不显著。究其原因,一是贸易开放程度反映了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在外向型经济体中贸易开放程度对国民收入具有促进作用,而在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贸易开放程度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十分有限。因此,在未区分经济结构特征的跨越组样本中,贸易开放程度与国民收入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二是金融发展程度衡量了信贷活动对经济发展激励效应。在间接融资比例较低或以国际信贷作为融资来源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指标则难以准确衡量信贷活动对经济发挥的作用。由于跨越组国家样本数量较少,结果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导致金融发展程度系数不具有统计意义。三是抚养比代表了一国单位劳动人口所需承担的抚养负担。表2列(2)在纳入人力资本指数后,抚养比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纳入城市化率指标后,抚养比与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回归系数变为负,且不具有统计意义。可能是因为,抚养比是一个具有极端化特征的指标,经济富足且生活压力小的人群更具有生育意愿,抚养比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极端贫困、缺乏节育知识和条件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生育率,抚养比也较高。而这两种情况存在截然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这可能成为抚养比的回归系数经济意义较弱的原因。

(三)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并非强制披露,且各宏观指标相互影响,因此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和反向因果问题。为此,本文采用传统的工具变量法以缓解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以所有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所得结论与前述分析一致,验证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2)	(3)	(4)
	lnGNI	lnGNI	lnGNI	lnGNI
HC_{t-1}	0.4893*** (3.71)			
GIN_{t-1}		-1.8627*** (-4.93)		
$Urban_{t-1}$			0.0021 (0.28)	0.1625*** (4.05)
$Urban_{t-1}^2$				-0.0012*** (-4.06)
Constant	6.0800*** (14.85)	8.8014*** (26.17)	7.2607*** (11.76)	2.1424 (1.54)
$Controls_{t-1}$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10	310	310	310
F	90.67***	94.45***	85.72***	88.40***
R ²	0.896	0.900	0.891	0.897

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采取以下处理:(1)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采用追赶指数的自然对数(lnCUI)衡量各国相对人均收入水平(赵凌云、杨来科,2021),具体采用各经济体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比值衡量。(2)替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首先,本文采用人口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投入的乘积(Edu)替代人力资本指数,构建新的人口质量红利衡量指标。其中,以高等院校入学率衡量人口受教育程度,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衡量教育投入。其次,采用前10%收入份额与后40%收入份额的比例(Unequal_r),重新衡量收入分配均衡程度。最后,以第三产业比重代替城市化率(Urban_r)。(3)剔除金融危机年份。剔除了1997年、1998年的样本以缓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剔除2008年和2009年

的样本缓解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4)滞后分析。将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放入回归。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符号和数值与前文所得结论基本一致^①,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18个国家1996~2019年的国别数据为样本,在借鉴现有文献与总结先进经济体转型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阶段内外部环境变化,探讨社会结构转型对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释放人口质量红利、提高收入分配均衡程度会促进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增长,城市化发展水平总体上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倒U型关系。由此可知,我国若要跨越中高收入组别,应推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实现更加均衡的收入分配,促使人口质量综合提升,释放人力资本红利,同时保证城市化水平与发展阶段的适配性。这将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同步转型,从而为国民总收入水平实现全面提升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 政策建议

以典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本文研究结论为依据,我们的政策建议如下:

1. 激发人口质量红利,构建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体系

我国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结构转型。科技进步要从引进模仿转变为自主创新,要从跟跑者向并行者和领跑者转变,需大力培养重点科技领域的高水平人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当前我国已进入人口质量红利时期,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与高收入国家持平。在科技领域人才储备相对充足前提下,突破科技发展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科技人才需要能够激发其创新活力的优质土壤,人力资本红利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创新具有偶然性和分散性,相对而言,基础科学、军事、航天等领域更多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产业领域技术创新更多依靠民间主体完成,但也不能缺少政府的支持与助力。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鼓励科技创新的制度保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激发人才技术创新活力,形成多方合作、良好协同的创新生态。

2.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

依据典型国家案例与前文研究结果,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有助于经济体实现向人力资本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减轻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负担,激发中等收入者向上发展潜力,避免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向下滑落,是我国当前应当关注的重点工作。中等收入群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该群体的安居乐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当切实改善中等收入群体生存环境,增加公租房与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增加教育补贴贷款规模,发放老人赡养津贴等,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负担,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3. 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城市化率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滞后于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然而,受到人口总规模提前达峰和少子化老龄化加剧的影响,未来人口跨区域流动的规模将有所减少,城市化发展速度将有所放缓。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内需扩大和消费提振,进一步带动高质量投资。当前我国城市化率超过65%,正处于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阶段,继续推动城市化进程既要考虑我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现实情况,也要切实解决户籍制度障碍、公共服务不平等、迁移成本较高等影响农村转移人口实现真正市民化的硬阻碍。因此,我们要以推进人口市民化为核心,有条件地破除城市与城镇的落户限制,实行户籍准入同城

^① 由于篇幅所限,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互认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促使转移人口在随迁子女就学、职业技能培训、医保跨省异地就医、公租房廉租房供给等方面实现真正地权益平等化。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2009:“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5:99—115 + 206。
- 蔡昉,2011:“‘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经验与针对性”,《经济学动态》,2011,12:4—9。
- 程文、张建华,2018:“产业创新升级视角下‘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产经评论》,2018,4:62—71。
- 都阳、蔡昉、屈小博、程杰,2014:“延续中国奇迹: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经济研究》,2014,8:4—13 + 78。
- 简新华、黄崧,2010:“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3:28—39。
- 孔泾源,2011:“‘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改革》,2011,10:5—13。
- 李培林,2017:“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劳动经济研究》,2017,1:3—20。
- 刘生龙、胡鞍钢,2010:“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经济研究》,2010,3:4—15。
- 刘伟、王灿、赵晓军、张辉,2018:“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现状、原因和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5:25—43。
- 李雪,2018:“全球市场下的垄断—竞争行业分割与收入不平等——以金融业和制造业为例”,《社会学研究》,2018,5:191—215 + 246。
- 刘欣,2018:“协调机制、支配结构与收入分配: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学研究》,2018,1:89—115 + 244。
- 李曦晨、张明,2023:“全球收入分配不平等:周期演进、驱动因素和潜在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4:40—53。
- 马晓河,2003:“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析”,《管理世界》,2003,9:62—67 + 94 - 156。
- 申广军、张川川,2016:“收入差距、社会分化与社会信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1:121—136。
- 孙立平,1996:“‘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6,5:22—32。
- 宿玉海、孙晓芹、李成友,2021:“收入分配与异质性消费结构——基于中等收入群体新测度”,《财经科学》,2021,9:80—95。
- 邢占军,2011:“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1:196—219 + 245—246。
- 郑秉文,2011:“‘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1,1:2—15 + 111。
- 张德荣,2013:“‘中等收入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经济研究》,2013,9:17—29。
- 张来明,2021:“中等收入国家成长为高收入国家的基本做法与思考”,《管理世界》,2021,2:1—11 + 262。
- 赵凌云、杨来科,2021:“价值链双向参与和‘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产经评论》,2021,2:150—160。
- 赵秋运、林志帆,2015:“‘欲速则不达’:金融抑制、产业结构扭曲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评论》,2015,3:17—30。
- 赵昕东、吴宇,2022:“提高教育水平是否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研究”,《中国软科学》,2022,7:129—139。
- Alesina, A. and D.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2): 465 - 490.
- Bertola, G., 1993. “Factor Shares and Savings in Endogenous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5): 1184 - 1198.
- Brunt, L. and C. García - Peñalosa, 2022. “Urbanisation and the Onset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32(642): 512 - 545.
- Cai, F., 2010.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Journal*. 3(2): 107 - 119.
- Cuaresma, J. C., W. Lutz, and W. Sanderson, 2014.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n Education Dividend.” *Demography*. 51(1): 299 - 315.
- Davern, M., 1997. “Social Networks and Economic Sociology: A Proposed Research Agenda for a More Complete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6(3): 287 - 302.
- De La Croix, D. and M. Doepke, 2003. “Inequality and Growth: Why Differential Fertility Mat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4): 1091 - 1113.

- Felipe J. , A. Abdon, and U. Kumar, 2012. “Tracking the Middle – Income Trap: What is It, Who is in It, and Why?”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Working Paper*. 715.
- Galor, O. and O. Moav, 2004. “From Physical to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4) : 1001 – 1026.
- Galor, O. and H. Zang, 1997. “Ferti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Cross – Country Evidence.”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 9(2) : 197 – 229.
- Hosan, S. , S. C. Karmaker, M. M. Rahman, A. J. Chapman, and B. B. Saha, 2022. “Dynamic Links amo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Digitalization, Energy Intensity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30.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 1 – 28.
- Lutz, W. , J. C. Cuaresma, E. Kebede, A. Prskawetz, W. C. Sanderson, and E. Striessnig, 2019. “Education Rather than Age Structure Brings Demographic Dividen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6(26) : 12798 – 12803.
- Mason, A. and R. Lee, 2006. “Reform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the Elder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pturing the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Genus*. 62(2) : 11 – 35.
- Ronald Lee, 2013.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the Biological Life Cycle, and Human Socie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8(1) : 23 – 35.
- Rosenberg, N. and M. Trajtenberg, 2004. “A General – Purpose Technology at Work: the Corliss Steam Engine in the Late – Nineteenth – Century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1) : 61 – 99.
- Temple, J. , 2005. “Dual Economy Models: A Primer for Growth Economists.” *Manchester School*. 73(4) : 435 – 478.

March Toward High – income Status and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Yan Kun¹ & Tang Dantong²

1. Faculty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 With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the increasing uncertainty of worldwid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is now at a critical stage of transitioning towards high – income statu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benchmark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actors on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The sample consists of country – specific data from 18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from 1996 to 2019, combined with 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Chin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study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quality factors,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n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release of population quality dividen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distribution balance will promote the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Additionally,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generally has an inverted U – shaped relationship with national income per capita.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support China’s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for the country’s leap towards a higher national income level.

Key words: Population Quality Dividend; Incom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Urbanization Process; Social Structural Transition

(责任编辑:兰鹏 王祎)